



四平老字号“三益永”的兴衰浮沉

侯景宝

四平曾经有个老字号叫“三益永”，它始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以生产毡帽、糕点享有盛名，名扬东北。1923年，由山东的刘俊明、辽宁的刘文卿和惠泉生三人集资合股在梨树县城开设的一家商业店铺，故起名为三益永，开始主要经销毡帽头。1930年前后，三益永由梨树县迁到了四平街道里三马路，1936年，“三益永”又迁到了道东三马路，扩大糕点生产规模，将毡帽头作为辅助性产品经销。1937年7月，四平铁东新市场划归四平街市管辖，脱离了梨树县，三益永老字号也归属了四平市。1947年，国民党官兵把“三益永”店铺洗劫一空，当即破产倒闭。

四平解放后，原三益永店铺刘志诚等人重新筹划并集资金股重办“三益永”，“三益永”店铺又重新开业。三益永糕点铺在四平享有盛誉，产品质优价廉，品种繁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店容店貌雅静，装潢新颖，店规严，服务态度热情周到，深受顾客信赖。糕点配方不减料，工艺要求严格，生产蛋糕不仅必须用鲜蛋，而且蛋清、蛋黄分开搅拌。达到规定的起发程度，擦抹用香油。产品特点有：口味好、绵软、弹性强。1956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三益永”经理刘志诚带头参加公私合营，许多糕点铺起而响应，使全市的糕点行业最先实现了公私合营，成立了“公私合营三益永糕点商店”。店址在铁东区三马路百货三商店南侧。厂房面积为342平方米，其中5间门市房为营业室，生产车间7间房，商店资产2万元。当时的经理是马贵汉、刘志诚，副经理是王秀丰。合营初期，依旧是手工操作，使用老锤、擀

面杖等简单工具，用吊炉烤制糕点，劳动强度大、产量低。1956年底，进行了技术改造，将吊炉改为链条式隧道炉，将烧木柴改为烧煤，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量。每天生产能力为一吨，营业额为1500元左右。1958年，公私合营三益永商店和酱园总店合并，成立四平市食品酿造厂。保留了糕点车间和三益永糕点门市部。当时私方人员106人，私股资金77万元，全厂职工2200人。该厂是公私合营企业。1966年，改名为地方国营四平市食品酿造厂，职工也全部变为全民所有制，资产全归国家所有。重新设立三个车间、两个批发部。即：糕点车间、糖果车间、酱菜车间，道里酱菜批发部、道东糖果批发部。

1982年12月，四平市食品厂筹建恢复新的三益永商店。1983年元旦正式开张营业。三益永糕点糖果商店发挥老字号优势，店铺门面悬挂着用木制圆球涂白漆穿在一起的两盘元宵。四平是三益永与长春的鼎丰真、吉林的福源馆并列为吉林省的三大传统食品店，三益永商店仍保持了原店的风貌，采用前店后厂，属大集体企业，以生产传统糕点为主，自产自销兼批发，同时经营烟酒糖茶和调味品，独立核算，大集体职工28人、国营职工4人，共计32人。三益永商店产值利润不断增长，年产值为25万元，利润3万元，年生产170多吨糕点。1984年，三益永商店荣获省、市“文明单位”和市“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称号。2003年，在企业改制中，三益永老字号商店倒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首任梨树县委书记沈亚钢

单志

首批人员撤走后，沈亚钢带几名武装队员骑马前往小城市，到达后，带领吴丕恩、刘启新等组织三、四、五区东路人员撤离。当晚，五区小城市党政人员和区武装中队夜宿小城市街里，二军分区副司令员马骥带一连人也住在街里。四区万发党政人员及区武装中队和三区郭家店党政人员住在小城市南一里多地的太平庄。时至半夜，三区工委书记刘汉卿觉得驻地不妥，找四区工委书记和区长徐成，副区长任恩荣表示，如果国民党大部队从郭小线压过来，我们有被吃掉的危险，需速转街里，这个提议确实关键，他们叫醒所有人员，快速转移。两区部队刚从西门进入小城市街里，突然国民党部队从西、南、东三面包围了小城市街。

枪炮声中，沈亚钢连外套也没来得及穿，同吴丕恩、刘启新立即组织突围，由于冷静沉着、组织严密、指挥有方，三个区的人马和分区的部队都悄无声息地从敌军的包围中钻了出来，出北门取道六屋，过了辽河去往双山。突围中，沈亚钢的一名警卫员开枪打死了另一名警卫员，叛变投敌。沈亚钢唯恐叛徒泄密敌人沿途追击，率领十几个武工队员在小城市北门外后卫阻击，队伍安全远去后，敌已逼近，沈亚钢率队撤离，取道八屋，在盖家船口过河追赶队伍，一场遭遇有惊无险。

梨树县委县民主政府、县大队以及各区工委、区政府、区中队撤至双山后，双山县委和县政府已经向北撤离，按二地委指示继续北撤至长岭县新集场，在新集场休整期间，沈亚钢奉命调到洮南任辽吉省二地委宣传部长，不久调任辽西省四地委任组织部长。这时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全党致力于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1947年7月，沈亚钢调任辽西省委民运部副部长。1948年1月调任辽西省哲里木盟地委副书记。在这时期，沈亚钢主要指导和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发动农民筹集粮草等军需物资，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全力支援东北解放战争。1949年夏，党组织调沈亚钢到武汉，由长期从事农村工作转为城市工作，任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城市组组长，不久提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3年至1954年任中南局城市工业部副部长，大区局撤销以后，沈亚钢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基建组工作。

三、为东北工业呕心沥血

1955年12月，沈亚钢奉调回到东北，任长春市委第二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吉林省委委员。主管长春市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工作。为长春工业的发展、城市交通的基本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一五”计划期间，长春的工业比较落后。沈亚钢的工作向来是思路清晰，讲究实际。到长春后，他立即对长春的工业状况进行摸底，深入到工厂、车间、班组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查找存在的问题，确定发展方向。随后，组织人员到工业发达的省、市地区，深入工厂、车间考察。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长春发展特点，符合长春实际的工业调整方案，使长春市的工业经济发展有了显著的提高。

沈亚钢思想敏捷，思维深邃。他对任何事物总是理智客观的看待，从不人云亦云。对1958年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盲目地“大跃进”“大深翻”“大炼钢铁”，高指标、高速度持有不同看法，曾受到省、市委的严厉批评。

沈亚钢注重生产效益，他对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增产节约运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非常热心，常抓不懈。先后总结出二道河子区、石棉厂、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经验，并召开现场会及时推广。共搜集长春市工业企业技术革命经验50多篇，编辑成《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经验汇编》，发至全市大、中、小工业企业，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活动和劳动竞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四）

我的初中时代

房国臣

末考试按年都用红纸张榜公布，贴在学校大山上墙上，看谁在后边坐“椅子”。

除学习课本知识以外，还要参加劳动，去双山林场铲过豆子，还去双辽农场割过水稻。学校也有劳动，每年下学期开学以后，头午上课下午劳动。全校学生给住宿舍冬天取暖烧炕打柴火，分担任务是：住宿舍100棚，走读生50棚，各班级劳动委员过数。打柴火那些日子学校操场熙熙攘攘，学生从四面八方，荒草野间，人背肩扛，屡屡行行，络绎不绝，个个汗流浹背，脸蛋弄得花蝴蝶似的，小布衫湿在了身上。

除学习劳动外，时常开展军训活动，全校师生曾拉练去双山东30多里大哈拉巴山，天刚亮集合队伍，一路急行军，搞军事演习，搜山抓“特务”。师生也曾经列队唱着歌曲，徒步来到双山南20多华里东辽河王河船口。由船信儿指导在规定范围水域地形内，进行一次游泳比赛。每年春季举行一次全校师生运动会。在学雷锋的日子里，人人做社会公益，怀着美好的理想，追求信仰爱祖国爱人民，坚持不懈地为人民服务，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利用课余时间去做食堂助炊压水、择菜，

打扫卫生，淘厕所。冬天早上，挎着土篮子去郊外捡粪，手冻得通红，狗皮帽子也挂上一层白霜。经过一冬天，操场北面各班级义务拾粪，搁在一块堆积如山。平时哪怕捡到一分钱也要扔到班级“雷锋节约箱”，学雷锋运动在校内外早已形成了风气。

体育老师林长荣，个子不高，浓眉大眼，身体较瘦，体育最擅长是单杠、双杠。单杠大车轮空中悠起来，体形如燕，使你眼花缭乱。平时哪怕捡到一分钱也要扔到班级“雷锋节约箱”，学雷锋运动在校内外早已形成了风气。体育老师林长荣，个子不高，浓眉大眼，身体较瘦，体育最擅长是单杠、双杠。单杠大车轮空中悠起来，体形如燕，使你眼花缭乱。平时哪怕捡到一分钱也要扔到班级“雷锋节约箱”，学雷锋运动在校内外早已形成了风气。体育老师林长荣，个子不高，浓眉大眼，身体较瘦，体育最擅长是单杠、双杠。单杠大车轮空中悠起来，体形如燕，使你眼花缭乱。平时哪怕捡到一分钱也要扔到班级“雷锋节约箱”，学雷锋运动在校内外早已形成了风气。

时光荏苒，离校虽然54年了，初中时代的寒窗苦读，师生友情，亲身经历的每一件事历历在目，都在我心中魂牵梦萦。

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范学校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经常在这里刑讯杀害中国人。柴纯然入学时，教室还悬挂着专门为刑讯吊打中国人用的粗木杆子，墙上留有大片的血迹，在平整操场时还挖出了一堆堆的尸骨，令人惨不忍睹。所有这些都让柴纯然和同学们愤恨不已。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迅速沦陷，日本侵略者竟然强迫各学校的师生和市民拿着小旗到大街上庆祝游行。这让柴纯然感到无比的心痛，他毅然决定借故不去参加游行。

1938年，在伪满建国大学读书的柴纯然参加了抗日救国秘密组织——“东北抗战机构”，后来担任了建国大学干事会的干事，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满抗日，铲除汉奸，收复东北失地。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和同学杨志忠、胡玉峰、佟钧凯等人建立了读书会，以读书会为掩护，秘密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他们深入到各年级向同学宣传爱国思想，传阅进步书刊等。1941年四五月间，柴纯然联络组织进步同学在王宏文的住所进行参加东北抗战机构的宣誓：“誓以至诚加入东北抗战机构，奉行中央抗战建国纲领收复东北失地，铲除汉奸，复兴中华民族，竭尽国民责任，励行同志义务，如违誓言，愿受制裁，谨誓。”为进一步开展工作，他们还办起了不定期刊物《前哨》，柴纯然经常给刊物撰稿，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

1942年3月2日，寒假返校后，柴纯然等人不幸被捕。在审讯中，伪法官诬称被捕学生是“国贼”，柴纯然义正辞严地痛斥他们说：“我们不是国贼，是爱国者，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我是一名中国人，日本侵略者到我们国家来，

欺负我们就不许反抗吗？”他还勇敢地承担责任，保护同学。有两人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较少而不承认自己参加了抗日组织，伪法院提出要有人作证，柴纯然坚定地说：“我们的组织根本没有这两个人。”

经过所谓的审讯，柴纯然被日伪法院以“治安维持法犯”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被送到伪满新京监狱（长通路清真寺街13号）服刑。

在伪满新京监狱，日本看守用胶皮板子毒打犯人。板子是用三四寸宽，约一尺半长的厚胶皮轮带做的，安一木柄，毒打时，把被打者的衣服剥光，立着，跪着或叫伏在地，日本看守用双手抱着木柄用全力毒打，有时从头部踢毒打数十下甚至数百下，每打一下，背部立即红肿起很高一条，其痛难忍，但又不许躲、不许叫，否则毒打更厉害。1943年夏，有一次，在1941年“一二·三〇事件”中被捕的佟钧铠（赵洪）等人在监房跪坐时腿下垫了衣服，被日本看守看见，就把全部政治犯叫出监房，用胶皮板子每人打一顿。同年9月某天晚间，王宏文、胡毓铮、那庚辰同室有一朝鲜族“犯人”唱歌，被日本看守听见，第二天早晨，全室的人都挨了一顿皮鞭毒打。又有一次，柴纯然为唱歌被毒打了几十胶皮板子，浑身青肿，痛得晚上不能睡觉。同年的二期同学王用中，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在狱中高唱抗日的歌曲。一天，日本看守刚开开门，王用中就跑了出去，看守追上王用中朝他的臀部就是一刀。王用中负伤后，柴纯然自愿耐心照顾王用中，给王用中端屎端尿，擦洗化脓的伤口，一直到王用中含恨离世。1944年1月30日，柴纯然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折磨下，也惨死狱中，年仅24岁。（未完待续）

